

# 訪談 | 戴錦華：創造不同的可能性，和多數人一起尋找未來——俄國革命的啟示

2018-01-01 滕威

微信公眾號：海螺社區

滕威：戴老師好！第一個問題，前幾天我讀到一個材料，談到蘇聯的科幻作家曾想像俄國革命百年的時候，也就是 2017 年，蘇聯社會和人民生活會是什麼樣的。很反諷的是，其中科技上的暢想基本都實現了。但是沒有想到的是，蘇聯不存在了。我們都知道霍布斯邦把 1914 年一戰爆發到 1991 年蘇聯解體這七十七年稱為“短二十世紀”，對資本主義而言，我覺得二十世紀是其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世紀，因為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好像資本主義最終戰勝了所有的敵人，而且全世界的人們都忙不迭地審判失敗者，比如 2015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紀實文學家阿列克謝耶維奇，她的紀實文學描寫了蘇聯社會中各種各樣的大問題。那麼，您覺得面對資本主義的全球勝利，同時伴隨而來的數碼轉型時代的發展，包括 AI 技術，資本主義彷彿被注入了強心針，在這樣的現狀下，我們怎麼面對社會主義失敗的歷史？

戴錦華：我認為這一次迸發出來的科技革命——突出的是基因工程和數碼技術，已然改變了我們提出問題和思考問題的前提和參數。這一次的科技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的全面突破和普遍應用，已然突破了現代性規劃的諸多限定性前提。面對這樣的事實，你可以說二十世紀終結、資本主義全面獲勝且漸入佳境，但是也可以說，這一突破，同時開始撕裂或威脅資本主義世界。至少，它正以加速度的方式、無可迴避地突顯了全球資本主義的內在危機和結構性問題。冷戰終結，祛除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威壓之後，資本主義“返璞歸真”，繼發的正是全球性的、愈加急劇的貧富分化。如果說，富人與窮人，是資本主義、乃至階級社會的基本事實，那麼“新”的變數是，幾乎完全由大資本掌控的新技術開發與應用，正在新一輪的財富洗牌中，加固、濃縮著壟斷、世襲的資本、財富結構。更重要的是，AI 技術的突破和廣泛應用，正在迅速地改寫並擴張著“自動化生產”的概念和事實；於是，它便持續地在整個世界製造著數量激增中的“棄民”——結構意義上的絕對剩餘勞動力，資本主義經濟學、統計學意義上的多餘人。曾經以勞動力密集型生產而在全球資本主義階序和鏈條的低端充當著必須的功能角色的第三世界，正在喪失其曾有的價值和意義；而在發達國家，這迅猛的淘汰過程，甚至越過了藍領社群，開始全面衝擊中產階級，甚至是某些中高層的特權職業：新聞記者、諮詢律師、種種經濟師……但問題是，當如此眾多的地區和如此高的人口比例正在或即將成為棄民的時候，全球資本主義便同樣開始流失其戰後由消費主義所牽引的慾望和消費的動力機制，資本主義在戰後創造的巨大的消費者人群正在持續縮水中。因此，最樂觀主義的說法是，資本主義自身已經達成了共產主義的基本條件：物質財富的湧流、異化勞動的消失；相對於今日資本主義，急需解決的問題只是社會財富的分配方式。我無法認同這一說法，首先在於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不僅表現在無法經由經濟手段解決的社會矛盾之上，而且表現為生態災難和能源危機。事實上，早已存在並不斷“加盟”棄民群體的，正是戰爭難民與生態難民。不錯，要解決全球性的貧富分化，或曰結構性貧窮，要安置新技術所造就和擴大的全球棄民，經濟學家們提供的解決方案：無論是全球稅收制度還是全球最低收入保障，都先在地要求世界政府的出現，要求強有力的非資本力量的整體掌控，非此，難於保障今日世界不陷於崩潰，惟此，才能維繫現代世界的生產結構繼續運行。然而，眾所周知的是，現代資本主義自身是建立在階級、種族制度和民族國家體系之上的，因此，其中不可能自發地產生全球政府或類似社會主義的福利保障制度。也正是在這一危機與解決方案的意義上，俄

國革命再度顯現了它的當下意義。我以為，對於今日現實，俄國革命的意義不再是在一國之內首先發生無產階級革命，或者說在資本主義的薄弱環節上尋找突破，創造一個不同資本主義的政權與發展道路。今天，俄國革命的啟示是，在完全沒有先例可援引的情況下，去創造不同的可能性，去尋找人類的解決方案。否則，我們所面臨的危機無疑是全球性的，而且蘊含著毀滅性的力度。

滕威：所以就是說，二十世紀或者“短二十世紀”這種所謂失敗的歷史，不一定會延續到二十一世紀，您的看法還是相對樂觀。

戴錦華：無所謂悲觀或樂觀，我認為十月革命對於今天的意義不在於類似的事件是否再次發生，而是俄國革命留給我們的歷史啟示意義。我們不僅是在歷史層面上理解或在認識俄國革命，也並非期待著它以同樣的方式在世界其他地方發生，而是在今日資本主義整體的結構性的危機，或者說資本主義的高峰與自我解體的意義上重提俄國革命。十月革命的意義，因此顯現為齊澤克所謂的：在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地方，創造馬克思主義。在歷史唯物史觀的意義上，這無疑是歷史的要求。

滕威：第二個問題是，今年是俄國十月革命一百週年，按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但是到目前為止似乎沒有看到俄羅斯國內有全國性歡慶的活動，而且普京本人也沒有發表過很明確的看法，所以西方媒體都用“曖昧”來形容他對俄國革命的態度。這也似乎表明了今天俄羅斯國內對這一百年歷史認知的分化。有歷史學家直接說“我們生活在歷史的精神分裂當中”。一方面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代以來，俄羅斯持續經歷一種對革命歷史的虛無化和污名化的意識形態重構過程；另一方面，解體後的十幾年，人民所想像的那個推翻了社會主義之後就會進入到民主或者是西方式幸福生活的圖景並未到來，所以對於俄國革命和社會主義歷史又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認識。但是俄羅斯官方強調今年紀念十月革命的活動必須要在歷史範疇內進行，不要政治化，那我覺得這種非政治化就是傳遞這樣的信息——俄國革命已經是歷史了，可以作為文物和故紙來研究，但是這一頁必須要翻過去了。結合今天俄羅斯在世界政治格局當中的角色，您怎麼評價俄羅斯對革命歷史的冷清和分化？

戴錦華：我認為用“精神分裂”來描述俄羅斯對於俄國革命的態度，顯然並不足夠的。在蘇聯解體至今，二十六年的時間內，整個俄羅斯的政權，可能某種意義上也包含俄國的民眾，仍無法去面對社會主義蘇聯的歷史及其消失，如果一定用精神病學的術語，那麼，他們仍整體地陷於一種失憶和失語的狀態。我有把握這樣說，是因為在俄羅斯國家歷史博物館當中，二十世紀的部分完全蒸發了。記得在紅場上的俄羅斯國家歷史博物館中，我曾無法相信歷史展示終了於 19 世紀，於是繞著博物館尋覓了許多圈，直到由一個講英語的館員確認：展示終止於 19 世紀。當然，我知道，“20 世紀”就在歷史博物館塵封的一側，佔據了這所建築的一半以上的空間。那是 2015 年，世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週年。我們知道，蘇聯在這場戰爭中的位置和作用，正是極端慘烈悲壯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40 萬陣亡紅軍，40 萬喪生平民，擊斃俘獲 75 萬德軍）整體地扭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戰場的戰局，阻止了法西斯納粹主義的世界“規劃”，盟國與軸心國的力量對比開始轉變。為此，英國首相丘吉爾在 1943 年的德黑蘭會議上代表英王向斯大林獻上了“榮譽之劍”。在這樣一個年份，對於這樣一段重要的歷史，俄羅斯國家博物館近旁的軍事博物館中只有一個一望而知是倉促準備的小展廳，基本上只有一些有限的圖片，而佔據後一博物館主廳的，是常設展覽，以豐富的展品炫示著 1812 年俄法戰爭的勝利。儘管這兩場戰爭間有著某種歷史的相似，用塔爾可夫斯基電影中旁白來說，便是俄羅斯兩度以自我犧牲拯救了歐洲。但二戰時期蘇聯的衛國戰爭卻不僅拯救了歐洲，而且拯救了世界。簡單地說，這一怪誕的事實展示俄國社會文化的基本困境是：俄國革命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一次創造、示範和實驗，不僅締造了第一個紅色國家，而且創造出“天下二分有其一”的社會主義陣營。然而，這段歷史卻無法在今天的全球邏輯

和俄羅斯的主流邏輯中為其找到位置和語言。

但是，造成如此失憶與失語的原因卻不只是因 20 世紀末的大失敗而喪失了的話語權和言說邏輯，而且是列寧主義實踐所攜帶並遺留的歷史議題。行走在終止於 19 世紀的俄羅斯國家博物館，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此前設定的（儘管經過修改的）內在敘事邏輯正是為了抵達 20 世紀的輝煌。其中貫穿性的線索，是一個晚發現代化國家如何嘗試並最終成為了一個世界強國；作為一個跨歐亞大陸的國家如何去對抗西方列強、至少躋身歐洲的巨大夢想和動力。毫無疑問，正是 20 世紀，昔日俄羅斯曾經以社會主義蘇聯這一超級大國/帝國的方式，實現了這一夢想。而今天回首，卻恍若南柯一夢。儘管昔日葉利欽解體蘇聯的說法是，恢復東正教的、俄羅斯民族國家。令今日俄羅斯無法面對的是，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歷史的終結，意味著社會主義陣營的消失，但是同時意味著蘇聯的解體，意味著俄羅斯迄今為止，只能勉強維持自己作為二流國家的國際地位位置。也就是說，革命的終結，同時意味著它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整體的墜落。這無疑也是俄羅斯失憶/失語症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20 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或曰列寧主義革命，普遍在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發生，其始終有著雙重參照系和雙重意義：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與現代意義上的民族自強之路。這也無疑是今日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落差。我曾反復說過，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我認為，我們可以將後一句中的主語理解為偏正詞組，也可以理解為雙主語：中國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意味著中國站起來了——一次贏得、保有完整政治主權並全面開啟現代化/工業化進程的時刻，一次或再次的獨立建國；同時，也許更重要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意味著人民站起來了——這是一場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是無產階級專政政權的建立，這是世界革命的組成部分。今天，中國能夠嘗試治愈 20 世紀最後 20 年的歷史失憶症、歷史“蒙太奇剪輯術”及失語症，正是在於中國崛起，令我們有可能、有餘裕將革命歷史與實踐移置到中國/一個民族國家現代化進程的曲折道路上來予以重述。俄羅斯則因自己在全世界體系中的新位置而喪失了“資格”。事實上，這也是昔日俄國十月革命曾令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人民欣喜的原因：不僅是人民、無產階級革命，也是一個晚發現代化國家，如何可能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威脅之下，尋找別樣的民族獨立、國家自強的道路。當年，十月革命正是在這一層面上，參與引發了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並在中國社會性質大辯論之後，推進中國知識界的整體向左轉。

滕威：從戈爾巴喬夫時代開始，俄國革命研究越來越右翼修正主義。比如一些歷史學家通過經濟學的數據，表明當時一戰前俄國的經濟其實是世界第五，而且已經進入到經濟增長率最高的國家之列，也有自己的金融市場，而且在一戰期間俄國經濟的衰退明顯低於其他的歐洲戰場的其他國家。在我們原來學的經典革命歷史敘述當中，都是認為十月革命是符合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歷史必然性，但是今天很多修正主義史學通過很多的細節和所謂的史料，表明當時列寧所代表布爾什維克黨能夠奪取革命領導權，在今天看來越來越呈現某種偶然性，再還加上革命之後的紅色恐怖，包括對沙皇一家的槍決，尤其是斯大林時代，對知識分子，甚至農民，包括少數族裔、女性、同性戀等邊緣社群的壓迫和暴力……最近幾十年的歷史學的研究，一直呈現這樣“祛魅”趨勢。因此，最近有一個美國的俄羅斯專家在《倫敦書評》發表文章，她總結說，十月革命的研究從肯定轉向否定，從關注工人階級轉向文化研究，從必然性研究轉向偶然性的揭示。她對此很遺憾。今天我們面對幾十年的右翼修正主義史學的敘事，還怎麼去重新書寫和闡釋俄國革命？

戴錦華：在這裡，我們不可能詳細、具體地從內部和外部來討論史觀、史學邏輯、史學原則和具體的史學著作。一般來說，古往今來，一個不變的、但今天也是盡人皆知的基本事實是，勝利者書寫歷史並審判失敗者。事實上，你重新扣訪任何一個重要歷史時刻，你都可能發現那個最終的結局產生於無數偶然，你甚至可以找到足夠充分的證據理論：歷史便是一系列偶然

的連綴。但是有趣的是，持有類似史學觀點的人大約不會將冷戰終結、蘇聯解體闡釋為偶然。  
滕威：對。

戴錦華：回到我們所熟悉的史學敘述中來，從列寧的理論思考和俄國革命的實踐，你不難發現即使人們能夠成功地把十月革命的成功書寫成一種偶然，但是這種偶然在無數其他的偶然中躍然而出、最終獲勝，顯然與列寧及其同代革命者早已做出了充分的理論思考和準備、展開了深入的社會動員和組織建設有關。所以對我說來回應類似的觀點沒有太大的意義。當然，主流的史學無疑會是修正史學，會不斷地篡改、否定或者抹殺俄國革命及其意義，但無論誰也沒有辦法徹底改寫二十世紀的歷史。面對金戈鐵馬、血雨腥風、波瀾壯闊的 20 世紀歷史，偶然論、微觀史學、道學八卦只能是有效也有限的修辭策略或意識形態腹語術而已。事實上，也始終存在著不一樣的聲音。諸如美國史學家所撰寫著作，以大量一手資料分析赫魯曉夫的蘇共 20 大的報告，依照他的材料，那幾乎就是一份十足謊言報告。而迄今為止，赫魯曉夫的這份報告仍是人們言說社會主義蘇聯和斯大林時代的主要依據。再比如俄羅斯本土歷史學家的著作，分析蘇聯解體的整個過程當中，工人階級幾乎無從發聲。也就是說，昔日的蘇聯民眾，或者說蘇聯工人階級，也許確乎拒絕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經濟路線，但是他們的替代方案是一種實踐人民民主的可能性，而不是全面的倒退回野蠻/黑幫資本主義。然而，在政治轉變時刻，他們沒有機會表達自己的選擇，沒有機會參與新的決策，這是第二點。整個審判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敘事邏輯，幾乎都是用暴力、血腥、屠殺的事實來作為支持審判集權主義（/社會主義）的罪證。類似史學書寫，用斯大林主義、尤其是 30 年代的血腥清黨，來整體覆蓋俄國革命。一如用紅色高棉、波爾布特的血腥統治來代稱或覆蓋 20 世紀國際共運史。或許類似敘述引證的是確定的事實，但敘述者有意無意間忽略的事實，首先是，列寧主義革命，從來不諱言自己的暴力特徵和屬性——“暴力革命，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用毛澤東的說法，便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力的行動。”我的理解是，拋開關於革命的種種正面、反面定義想像和闡釋，任何真正的革命——無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的，都必然包含著某種整體性的、大規模的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遑論嘗試均貧富，進而剷除私有製。這便決定了革命不可能免除暴力的因素。這與個人的好惡無關，也從來不可能是單純的人為選擇（無論是渴望還是拒絕）。其次，類似與俄國革命相關的敘述，與社會主義相關的“暴行”的書寫和控訴，基本上是建立在非歷史化前提上。不僅拋開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中西方陣營的暴行、第三世界的暴行，更拋開整部現代史中殖民擴張的暴行、虐殺。同時，非歷史化的特徵之一，便是不討論具體的歷史結構與情勢，不討論每一次“暴行”何以發生，不區別“暴行”與“暴行”之間內部與外部差異，相反，代之以某種想像性的、夢幻式的、理想的社會政治狀態來作為這些特定“暴行”的底景。儘管對我說來，叩問歷史，分辨歷史中的暴行，並不是為了選擇性遺忘或赦免某一類特定的暴行。相反，活著，是為了記憶。如果我們的目標或信念的烏托邦是為了正義和人類解放，那麼這其中必須包含死者的正義——不遭遺忘和抹殺。扣訪歷史、拒絕非歷史化，拒絕勝利者的邏輯，拒絕對失敗者的審判，正是為了拒絕遺忘。

如果說，今天我們需要什麼新的角度去重讀俄國革命，我認為無外乎兩種。一種是我們已然談過的：我們必須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新情勢中，重新認知俄國革命的啟示。因為今天資本主義全球化已成為了一個突出而真切的事實。全球資本主義的金融市場、其生產鏈條和市場鏈條、為龐大的、高耗能的運輸線所組織起來的物流系統，將整個世界緊密地組織在一起。資本主義不再有它的外部。並非如馬克思所預言的，世界一分为二，漸次極化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孕育並養成了他的掘墓人；然而，今日世界又確如馬克思所預言，資本主義最終完成了它對整個世界的佔有和征服，同時創造出了自我抹除和毀滅的條件。但問題是，資本主義之後是什麼？如何避免資本主義的末日最終成為人類的、地球的末日？今日世界，

一邊是金融資本、全球生產鏈與物流鏈整合了世界、聯合起全球資產者，另一邊，則是全世界的勞動者、尤其是棄民被深刻地分割在民族國家的疆界之內。與此同時，則是全球性的流動，以艾科所謂“種族遷徙”而非“移民”的規模發生並持續。與少數精英的頂層流動同時的，是形形色色的非法移民、難民，由此伴隨著另一種分割與衝突：種族主義、右翼民粹、恐怖襲擊，以及它們必然的衍生物：法西斯主義的威脅。與這個結論相關的是另外一個層次問題，底層移民所形成的巨大的全球流動，還是艾柯的那個說法，即，這類流動達到了種族遷徙的規模，而不只是移民的幅度。說句題外話，為修正主義史學所遮蔽的、關於 20 世紀的一個重要事實便是，曾經，只有國際共產主義的力量嘗試阻止、對決國際法西斯主義；而彼時的“自由世界”出於共產主義的恐懼和忌憚，在這場嚴酷對決中袖手旁觀，最終令法西斯在歐洲坐大。回到我們的話題中來，我認為，面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新情勢、發展與危機，我們面臨著一個幾乎沒有改變希望和可能的現實，一個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及其預言不能覆蓋的現實。因此，俄國革命的意義和啟示，首先在於對新的社會可能性的創造。這一新的可能性的意義在於帶我們整體地走出困境，讓多數人能夠在未來改變中獲益的希望。

而在另一邊，重述俄國革命史是一百年之後歷史回望。我一直認為，有效的方式不是面對勝利者的審判詞去展開辯護。事實上，我始終拒絕充當任何意義上的辯護人。因為辯護人的角色，意味先在地接受了勝利者的法庭、法律與遊戲規則，意味接受有罪指認可能成立的前提。對我，有意義的工作，是自覺地承擔起 20 世紀紅色歷史遺產的繼承人、同時必然是紅色歷史的清算者的角色。對我，這份與寶貴的遺產同樣、也許更加沉重的債務，並不是審判者清單上羅列的罪行，而是一份深刻的反思和追問。不該忘記，20 世紀國際主義運動，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主義陣營，並不是被資本主義所征服或瓦解的，相反，是不戰而敗、自我引爆的。那麼，其政治邏輯、文化邏輯和社會組織形態……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面對這全新的、也是危機重重的世界，重啟 20 世紀的紅色遺產分外清晰和急迫；但我們都知道遺產的啟動必須以債務的清理為前提。是啊，我絲毫沒有願望，也不認為有必要和任何主流史學展開對話或論戰。因為他們不僅理所當然地在審判俄國革命，他們也在全面地審判法國大革命——法國的及歐美的修正史學正全面、“客觀地”、負面地重寫法國革命是——眾所周知，那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主部樂章，是現代史的開啟時刻。在思想史與政治史的意義上，近而三十年來的最重要的主流範式轉移之一，便是以美國革命取代、覆蓋或否定法國革命；有所謂經濟模式取代政治模式。然而，無需贅言，這股巨大的、全球性的告別革命的思想、文化取向，其自身顯影了對革命的歷史、對 20 世紀記憶的巨大恐懼，或者說，革命的幽靈仍對全球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獲益者顯現著巨大威脅。幽靈學之所以成了世紀之交的新創，正在於怪影密布、幽靈迭出。也正是為此，俄國革命再度凸顯出開端的意義——不僅是 20 世紀的歷史，也是歷史朝向未來的延伸。我們可以藉此重新尋找我們的主體位置，和多數人一起尋找並爭取共同的未來。

滕威：最近海螺推送了齊澤克的文章《在未知領域航行的列寧》，他在文章開頭提到，2017 年，我們不僅僅要慶祝十月革命一百週年，也要慶祝《資本論》初版問世一百五十週年，還要慶祝上海公社奪權五十週年。他似乎覺得這三件事代表了共產主義運動的三個階段。我們作為中國人從小耳熟能詳的一句話是，俄國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但是好像到目前為止，我們國內對俄國革命的紀念也很少。您能否進一步在現實參照下，談談俄國革命的遺產意義嗎？

戴錦華：我們前面已經談到過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的雙重歷史意義：對無產階級革命、世界革命的自覺意識，和尋找另類道路，謀求被壓迫民族和國家獨立建國的意義。十月革命的啟示意義，令五四運動而非辛亥革命，事實上成了中國現代歷史的真正開啟時刻。2017 年中國面對俄國革命的困境，也是整個新世紀以來中國統治階層

始終面臨的困境。俄國革命對於中國的啟示，是五四運動得以形成的主要助推，也是對新文化運動也就是真正現代中國誕生的推動。真正現代中國並不是在辛亥革命誕生，而是通過五四運動而誕生。在中國，追溯十月革命的歷史意義，也就是要追溯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史，左翼思想史與革命史。

但我以為，十月革命對今日世界的直接而重要的啟示，便是再度思考新的歷史主體的命名可能並嘗試召喚這一主體。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是一個欠發達的農業國家，但列寧主義的實踐，最終令其成了第一個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國家。換言之，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無產階級，不僅指認出一個成長中的階級，而且成就了一個重要的命名，對未來歷史主體的命名。因此，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踐，才能在俄國和中國召喚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儘管毫無疑問，這一經由水兵起義、城市工人武裝暴動而取得的紅色政權的性質，也決定了政權建立伊始，立刻陷入了紅色城市政權為廣大的灰色的鄉村地帶所圍困的局面。這一事實，也決定了繼而密集出現的紅色暴力。）相對於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的新情勢，俄國革命的啟示，也正指向急迫而基本的理論與實踐命題：何為今日世界的未來歷史主體，是怎樣的力量和人群可以承擔起、開創出資本主義之後的世界？在廣大的消費者/負債者（也是喪失了社會上行空間之後的城市中產青年群體）、第三世界的勞動者和遍及整個世界的新舊棄民之間，整合的力量與歷史之名何在？對我，這俄國革命啟示常新、常在的意義。

滕威：最後問一個問題，作為電影研究者，我們都知道俄國革命對二十世紀的電影藝術發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想聽您再回溯一下這段歷史？

戴錦華：這裡有兩個基本或者重要的側面。一個側面是，我們知道，俄國、尤其是紅色俄國是電影藝術的誕生地之一。如果說早期美國電影以“最後一分鐘營救”開創了電影藝術的修辭學，那麼，正是蘇聯蒙太奇學派及蒙太奇理論和實踐，令電影成為藝術，並且嘗試抵達哲學表達層面。曾經，在世界電影史上，不僅存在著所謂商業電影與藝術電影的二分世界，而是天下四分：在美國的好萊塢電影、西歐的藝術電影之畔，是蘇聯及東歐的政治-藝術電影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各色各式的民族寓言電影。蘇聯電影曾和蘇聯文學、音樂及美術一起在俄國革命之後、尤其是冷戰之中，影響和感召著世界上的幾代人。另一個側面則是：電影，不僅是最偉大的 20 世紀藝術之一，也是某種民族-跨國工業系統，是某種意義上國家實力（不僅是軟實力）的標識，在某些情況下充當特定的國家形象名片。而昔日美蘇爭霸的時代，他們亦同時作為兩大電影工業系統，兩大膠片工業系統，當然，是兩種水火不容的意識形態，也是兩種電影美學體系和電影語言形態。人們似乎忘記了，為今日世界奉為電影藝術大師的塔爾可夫斯基正是在蘇聯電影工業與蘇聯-俄羅斯文化土壤中成長並創作的。但隨著蘇聯的解體和俄國的墜落，昔日龐大的國家電影工業體系一朝覆亡。最悲慘的時候，在廣袤的俄羅斯國土上只剩下七塊銀幕。同時流散的是關於蘇聯電影藝術的歷史和記憶。我接觸過一些俄羅斯電影人、一些莫斯科電影學院的青年老師和學生，他們關於自己的電影大師的真正記憶，只剩下塔爾可夫斯基，而對於愛森斯坦、普多夫金、維爾托夫……，他們的反應是陌生、準確地說，是極端漠然。

滕威：不會吧。

戴錦華：的確如此。一如俄羅斯始終沒能重建自己在全世界體系中的大國位置，俄羅斯也始終沒能重建自己的電影工業體系。今天為世界所知曉的俄羅斯電影，一如多數非西方國家，幾乎只是為國際藝術電影節所青睞的某幾部藝術電影。其中頗具症候性、在我看來也是悲劇性的一類，是索科洛夫（蘇古諾夫）的《浮士德》，這部據稱為“俄羅斯文化振興基金會”資助的藝術電影的選題居然是德國經典名著，而且必須直接以普京個人運作的資金方得以拍攝完成。蘇聯-俄國電影美學的再度浮現，卻赤裸地應用於幾乎是跪舔勝利者的文化表達之中。而另一些，則直接、間接地成為那份歷史失憶與失語處夢語：諸如奇特凸顯的種種極端密切的父子故事（甚至絕非同志表述的父子戀），諸如一對父子的道路故事索性名之為《地圖上

消失的名字》，或混雜著濃重的基督教（東正教）氣息的弑父-殺子故事《歸來》。在我解讀中，那無疑是一份充滿了夢魘感與血腥味的、糾結、纏綿、無力的、朝向前蘇聯的鄉愁。一段被殺之子的鬼魂遊蕩，也是一份弑父之後罪疚與瘋狂。

聯繫著俄國革命，重新審視蘇聯-俄羅斯電影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其中幾乎如一幅全息圖畫的碎片一樣，包含了我們試圖反思、清理並再度啟動的全部（至少是大部分）議題。究其要點，其一是蘇聯電影的輝煌直接源自十月革命成功後，列寧所製定的、對電影高度重視、向電影傾斜的文藝政策。列寧的先見不僅表現在他預見了電影所可能具有的公共性與大眾性，而且在於他對未來的整體政治文化規劃：建立社會主義的新文化，以召喚新人，建設並最終抵達新社會。我自己觀點之一是，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社會主義陣營的不戰而敗、或自我引爆，其重要的、甚至首要的原因，是創造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努力和嘗試的失敗；西方世界和平演變的成功正緣自東方陣營文化建設的失敗。新文化，不是、也不可能是單純的宣傳、或意識形態教化（/“洗腦”），而是全新的邏輯與價值。其次，社會主義蘇聯之所以會成為世界電影藝術的發祥地之一，正在於他曾是全球另一個意義上的文化革命風暴：現代主義運動的內在組成部分；構成主義、未來主義、立體主義……都曾以十月革命前後俄羅斯-蘇聯藝術家、電影人為標識。對我，這構成歷史債務中一個重要的議題與謎題：即，社會主義政權與現代主義藝術運動間的形同水火的歷史關係。儘管在我看來，如果我們不能簡單地將現代主義藝術運動與20世紀前期資本主義的空前危機相聯，不能直接將現代主義藝術運動等同於資產階級文化的自我仇恨或批判；我們至少可以肯定地指出：現代主義藝術運動是現代性最深刻的內在矛盾的自覺曝露，幾乎所有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都以某種方式重視或認同於現代藝術的社會、文化訴求及他們攜帶的美學革命意義。但以蘇聯為肇始，攜帶藝術運動卻幾乎與新政權的建立和鞏固同步遭到封殺。這間或將我們引入俄國革命或列寧主義實踐的深處，去思考民族國家與無產階級政權間的內在張力，去思考革命與秩序、人民與權力的多重命題。不錯，電影，從來都不只是電影而已。

滕威：謝謝您！

2017年6月8日

本訪談應武藤一羊先生邀請所做，日文版收入武藤一羊主編的《俄國革命紀念文集》，英文版發表在Global U網站。